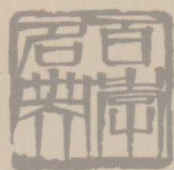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 中国哲学史通论

■ 范寿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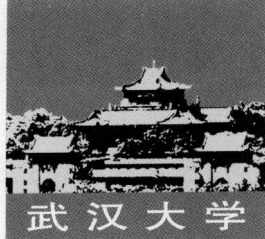


根澂葉茂 實亦聲洪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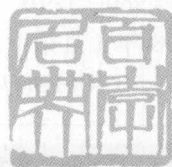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 中国哲学史通论

■ 范寿康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通论/范寿康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4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6121-7

I. 中… II. 范… III. 哲学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922 号

责任编辑:刘新英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98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29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121-7/B · 205 定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顾海良

副主任委员 胡德坤 黄进 周茂荣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郭齐勇 顾海良

黄进 曾令良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范寿康**（1896~1983），字允臧，浙江上虞人，20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与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获教育与哲学硕士学士。1923年回国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上虞春晖中学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处长，后又升任第三厅副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主持台湾教育重建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从政界引退，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1982年4月从台湾取道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定居北京，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3年2月逝世于北京。

范寿康先生毕生从事哲学教育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哲学通论》、《中国哲学史通论》、《朱子及其哲学》、《教育哲学大纲》等。

##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 再版说明

《中国哲学史通论》是范寿康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最初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于1983年由三联书店重印。这次我们将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依据的是三联书店的版本。为方便读者阅读，并尽可能保持全书的原貌及风格，我们将繁体竖版改为简体横版，另对少量文字及标点做了订正，其他未作改动。特此说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

## 再版前言

李维武

1937年，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由开明书店出版<sup>①</sup>。这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程的第一部教材，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70年来，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部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及其意义并没有随着岁月流失而湮灭。它在1983年由三联书店原版重印，在今天又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重新出版，都是其证明。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能够对《中国哲学史通论》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就范寿康其人其学及《中国哲学史通论》其书作一简要介绍。

### 一、范寿康：“学术——从政——学术”的人生道路

范寿康(1896~1983年)，字允臧，浙江上虞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他的一生，与时代的巨大变化相伴随，经历了

---

<sup>①</sup> 关于《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初版时间，范寿康在《三联重版〈中国哲学史通论〉序言》中说：“1930年代初(对日抗战前)，余在武汉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担任中国哲学史讲座。当时编有讲义，三年成书，名《中国哲学史通论》，由前辈夏丏尊先生题签，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时在1936年左右，直至解放后开明改组，停印为止。”(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序言第1页)这里的“1936年左右”，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今查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载录《中国哲学史通论》“1937年6月初版”(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故以此为《中国哲学史通论》初版确切时间。



“学术——从政——学术”的曲折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与传播，也留下了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范寿康早年入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以后就读于宁波府中学堂、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受到新式近代教育。1913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主修教育与哲学，获教育与哲学硕士学位。1923年归国，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哲学教育部编辑，主编《教育大词典》。三年后，开始从事学校教育：192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1927年，任上虞春晖中学校长；1932年，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1933年至1938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主编。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学术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时间最长。而他的哲学思想的成熟，并通过自己的著述作系统的阐发，也主要在武大任教期间。

早在日本留学时，范寿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1921年，他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上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以分段注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形式，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层层深入的讲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他在课堂上介绍唯物辩证法，用唯物史观讲解中国哲学史，受到进步学生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他写出《哲学通论》和《中国哲学史通论》二书，前书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出版，后书由开明书店于1937年出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上，他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今天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就是以当年的范寿康为其源头的。

范寿康又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与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撰写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卢梭》、《康德》四书，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卢梭和康德的生平及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介绍，由商务印书馆纳入《百科小丛书》和《万有文库》出版，成为中国哲学界以个案形式介绍这些西方哲学家的第一批专著。他对西方现代哲学也有专门的研究，在武大任教期间就曾发表过《新实在论浅释》、

《实用主义》等论文。他所著《哲学及其根本问题》一书，由开明书店于1930年出版，其中对于现代哲学的研究问题作了明确的揭示，认为：“从前哲学的研究问题，是偏向于探求实在或本体方面的；而现代哲学的研究问题，却是在于探求绝对的价值或普遍妥当性上面。”<sup>①</sup>

范寿康还对教育的理论与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他撰写了有关教育哲学、教育学、教育史的多种著述。其中，尤对现代教育哲学作了开创性的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他所著《教育哲学大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以“教育哲学”为题名的专著。该书指出：“教育哲学是应用哲学的一种，而这种教育哲学，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及法律哲学一样，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教育哲学的重要部分有三部，就是(1)教育论理学，(2)教育美学，(3)教育伦理学。”<sup>②</sup>该书从这三部出发，全面论述了在教育中如何实现真、善、美，把现实的人提高到理想的人的问题。该书已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出版。

范寿康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心目中，哲学是一种对真理的神圣追求，学哲学最需要有一种彻底求真的积极精神。他告诫初入哲学大门的同学们：“哲学决不是一种知识上的游戏，也决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学问。真正的哲学乃是一种要求彻底的论理思索的积极的学问。没有这种积极的精神，就不能走进哲学的大门。”<sup>③</sup>“凡是想研究哲学的人，就不可不都抱那种哲学研究上所必不可少的‘彻底求真’的精神。换言之，他们在追求真理上就不可不都取一种彻底的、勇敢的、积极的、虚心的态度。”<sup>④</sup>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寿康走出书斋和教室，毅然以一介书生投身

① 范寿康：《哲学及其根本问题》，开明书店1930年版，第34页。

② 范寿康：《教育哲学大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范著中的“论理学”，今通译为“逻辑学”。

③ 范寿康：《哲学通论》，中华书局1935年版，自序第2页。

④ 范寿康：《哲学通论》，中华书局1935年版，自序第2~3页。

时代的大洪流，应郭沫若的邀请，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政治部第三厅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产物，由从海外流亡归来的郭沫若任厅长，集结了一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实际上在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范寿康先任第三厅第七处处长，主持对敌宣传工作，后又升任第三厅副厅长，协助厅长郭沫若工作。在这期间，他与一批共产党员学者合作共事，第七处的三个科长中，第一科科长杜国庠、第三科科长冯乃超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共产党人，冯乃超还是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以后，他又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研究室主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行政院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重归中国。范寿康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赴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主持台湾教育重建工作。此时，日本已占领台湾近半个世纪，在台湾长期实行去中国化的殖民教育，对台湾青年一代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针对这种严重的状况，范寿康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台湾教育的中国化：颁发《台湾省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接收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公立国民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由各州厅接管委员会或市政府直接接收，校长一律派由中国人接充；力主在台湾教育中加强增进国家民族意识的教育，以改变台湾青年对祖国思想文化的隔阂；组织国语推行委员会，全力普及国语教育，以恢复台湾民众与中国文化的联系纽带；创设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为光复后的台湾教育事业培养合格教师；对台湾复杂的殖民地学制进行改造，统一为中国大陆实施的“六三三四”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范寿康的这些措施，对实现台湾教育的中国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台湾教育较快地扫除了殖民地色彩，有效地促进了台湾青年和民众对祖国的认同。可以说，主持光复后的台湾教育重建工作，是范寿康作为一个教育家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他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书写的精彩篇章，是他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由于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范寿

康从政界引退，再度回到大学校园，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学术时期。这时台湾的政治环境，已不允许他再在课堂上和著述中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改而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著《朱子及其哲学》就是其代表作。他之所以对朱熹情有独钟，专门予以阐发，在于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朱子为南宋时代出生的一个儒家里面的大哲学家与大教育家。”<sup>①</sup>他在书中论述朱熹政治思想时动情地说：“他生当外族侵袭，朝廷偏安之际，竭力反对和议，主张积极备战，期早日恢复中原，朱子不愧为一个爱国的志士。”<sup>②</sup>朱熹的人生与学问的这一特点，与范寿康的人生与学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教育事业的阐发与总结，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范寿康自己一生的理想与追求。

范寿康在台湾的学术生活十分平静，但他内心却深切地怀念着祖国大陆，尽管年事已高，也不能改变他重回祖国大陆的努力。1982年4月，他终于以86岁高龄从台湾辗转取道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回归行动，在海峡两岸引起很大反响。以后，他定居北京，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1983年2月27日，范寿康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曲折而精彩的人生道路。

## 二、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这一特点，在他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哲学通论》和《中国哲学史通论》二书及发表的学术文章中，尤其鲜明地显示出来。

范寿康于1933年秋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后，就在当年底出版的《国

<sup>①</sup> 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序言第1页。

<sup>②</sup> 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页。

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上发表了《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一文，旗帜鲜明地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有远大的前程。他在文章中指出：“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新兴的哲学上的一个体系。它的源泉放在自然的观察、历史的检讨和思惟的研究上面。它的目的在想对自然、历史和思惟三者树立普遍的法则。它反对把事物分别地及在固定不变的状态上加以观察。它主张把事物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上及在发展上加以观察。如说哲学的理论应该依据事实，不应凭空妄谈，那么，这一种新哲学，现在虽尚在摇篮之中，想来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sup>①</sup>范寿康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值得赞成和认同，之所以会有光华灿烂的未来，就在于它代表了哲学唯物论的最正确的发展。在他看来，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观念论（即唯心论）与唯物论两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哲学上的学说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拘在于过去与现在，我们在哲学上都可以发见极多的不同的方向。而这些方向，或在根本的问题上，或在次要的问题上，各持异说，莫衷一是。但是，假定我们注意于学说里面所含的最主要的本质的时候，那末，我们得把一切哲学上的学说分为两个基本的方向。一个方向把精神看做基本的根源，另一个方向却把物质或自然看做基本的根源。一个方向在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时从精神的根源出发，另一个方向却从物质的诸原因出发。前者是观念论，后者是唯物论。”<sup>②</sup>对于哲学上的这两个基本方向，范寿康在文中从西方近代哲学史出发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在观念论方向上，他着重考察了贝克莱的主观的观念论、康德的先验的观念论、黑格尔的客观的观念论之间的开展；在唯物论方向上，他着重考察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之间的演进。通过这种考察，他既指出了观念论的理论困境，又指出了机械唯物论的

<sup>①</sup> 范寿康：《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第37页。

<sup>②</sup> 范寿康：《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第1页。

理论不足，认为唯物论只有吸取存在于观念论中的辩证法，形成新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才能进一步推进哲学的发展。他说：“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机械的)和观念论都含缺点，所以我们果想对于自然、历史及思惟三者树立普遍的法则，那末，我们似乎在最近哲学诸方向中只有采取辩证法的唯物论的一途。”<sup>①</sup>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对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合逻辑的超越，看作是对西方哲学史已有思想成果的新综合和新开展，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机地融贯起来。用这种思路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历史，又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学理性，显示出一种透彻的说服力。

在《哲学通论》一书中，范寿康则对唯物辩证法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指出：“现今所谓唯物辩证法乃系对于自然、历史及思惟，探求普遍的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反对对于事物加以个别的观察，并反对将事物在固定不变的关系上加以观察。这种方法主张把事物在最普遍的关系上，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上，在发展上，加以观察。这种辩证法成立的根据有三：(一)由于自然的观察，(二)由于人类历史的检讨，(三)由于人类思惟的研究。”<sup>②</sup>在书中，他着重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两大哲学问题入手，分两编来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与基本思想：第一编《知识哲学(认识论)》，通过对西方认识论史的考察，最后通过对康德知识哲学的批评，来论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该编第五章《结论》第二节即《辩证唯物论者的认识论》；第二编《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通过对西方本体论史和宇宙论史的考察，最后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批评，来论述辩证唯物论，该编第四章《结论》第二节即《辩证的唯物论》。在这里，他进一步从西方哲学问题史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说明。通过这些以史出论的说明，范寿康得出总的结论：“辩证的唯物论的体系的建立还不过是最近数十年

<sup>①</sup> 范寿康：《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第29页。

<sup>②</sup> 范寿康：《哲学通论》，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20页。

来的事。辩证的唯物论的发源地为德国，目下则大有普及于全世界的趋势。”<sup>①</sup>

范寿康又在中国哲学史讲授中，引入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这成为《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的最大特点。范寿康晚年在《三联重版〈中国哲学史通论〉序言》中，对此有过专门的说明：“查本书内容平平，但观点却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sup>②</sup>在该书《绪论》中，他明确地指出：“在历史的解释上是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大体讲，最大的派别有二：一派把历史看做是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因此在历史的进展上，我们并无原则可以探求；另一派却把历史不看做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以为历史的进展，和自然界的演进相仿佛，是必然的，所以其中也不无原则可寻。固然，我们人类对于历史的进展多少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力量，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也未始全无用力的余地；但是这人类的力量，若与整个人类社会进展的力量相较，是非常渺小的。所以，如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鉴往知来，那末，我们对于历史进展上的原则应该加意探究，自不待言。”<sup>③</sup>在这两派之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现在站在后一派的立场上”<sup>④</sup>。这个“后一派的立场”，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立场。随后，他以十多页的篇幅，论述了历史观的三个基本问题：（一）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原则；（二）社会形态的推移的至要阶段；（三）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从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他最后强调：“社会存在里面的基础的构造就是经济的诸关系（也就是所谓生产诸关系）。由原始共产制变为奴隶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由封建制变为赁银劳动制，这就是经济的诸关系的转变。而在上面所举的社会诸形态之中，除原始共产制以外，都包含有榨取阶级及被榨取阶级的对立。而且同时，榨取阶级为压迫被榨取阶级起

① 范寿康：《哲学通论》，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186 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③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5 页。

④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5 页。

见，各设有一种强制的权力装置，这一种装置就是所谓政治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站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结构。因为政治的结构，不外是一种站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结构，所以政治的结构是完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不但政治的形态如此，此外如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一言以蔽之，观念的——诸形态也是完全站在经济基础上面，也就完全是经济基础的上层结构。这观念诸形态，也与政治形态一样，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这样看来，各种形态，无论是政治的或观念的，都站在经济基础上面。”<sup>①</sup>在这里，范寿康对奴隶制以后的社会形态的看法，在今天看来未必准确，但他的总体思想，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出发，范寿康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大的阶段：（一）殷代以前的原始共产制时代；（二）殷代的奴隶制时代；（三）周代的封建制时代；（四）自秦初至鸦片战争的单纯商品经济制时代；（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的资本主义制时代。他进而指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国哲学，正是在这些中国社会形态变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有三个重要的转变期：一是殷周之际，中国社会由奴隶制推移为封建制，出现了《易》的辩证观及史官与筮人二派的哲学。进至春秋战国，由于一方面诸侯强盛，势压王室，另一方面生产力比前进步，旧有制度逐渐崩溃，于是时局混乱，思想亦出现庞杂的现象，儒、道、墨、名、法各家学派争起，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有一个生气的一个时代。二是秦汉时期，由于秦用商鞅之说，准许人民对土地的私有，秦始皇遂得统一中国，中国社会由封建制推移到单纯商品经济制，中国哲学由此经历复杂变化：从汉至清，儒、道、佛三家递相消长，但三家俱求依附于帝王，以供帝王的御用，则是一致的。三是自鸦片战争后，西洋文化的大量输入，机械工业品及机械工业促进了中国二千余年来的手工业的崩溃，前资本主义经济制不得不推移到资本主义经济制，这一转变时期的哲学大体为今文学派，表面上虽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据，但实际上受有西洋思想

<sup>①</sup>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8~19 页。



的影响，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的机械工业因种种关系没有健全的发展，国家人民都不能找到相当的出路，因此国势危急，时局混乱，思想界的庞杂的状况可以说是从来未有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

通过对中国哲学历史走向的总体性考察，范寿康进而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提出了中国哲学及思想发展的新方向。他说：“从前的中国是闭关自守的，现在的中国已为世界的中国了。我们果想找思想的正当的出路，就不可不先把整个中国的出路加以考虑；而我们果想找整个中国的出路，又不可不先把中国经济的出路加以考虑；而我们果想找中国经济的出路，尤不可不把世界经济的出路加以考虑。天然生成的西藏的高原和东面的大海已经不能保障我们从来的孤立了。二千余年前人土造成的万里长城已经不能抵挡近代的进攻的武器了。我们祖先一直用到如今的那一套锄头犁耙已经比不上最新式的电耕机了。我们旧有的手工业已经抵不过机械化的大量生产了。张天师的灵符，班禅喇嘛的经咒，孔夫子的微言大义，已经不能抵挡住这侵略的狂潮，挽救农村没落的命运了。要之，现今的中国，尽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我们生在这千钧一发危急存亡的今日，我们应当张大眼睛直视世界的实际来决定中国今后应取的方针。我们不要胆怯，我们也不要疏忽。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我们要精细地考虑，我们并要切实地实践。世界资本主义的先进各国，如上所述，因为机械工业发达的结果，发生了生产的过剩与贫富的悬隔二种大病。前者为世界国际一切纠纷的基本，后者为它们国内一切纠纷的渊源。科学与机械本来是足以增进人类全般的福利的，可是因为上述两种事实的缘故，科学与机械反而有时只能满足少数特殊阶级的过分的享乐，有时甚至于引起世界全般的不幸与罪恶。这样，科学与机械是被滥用着。这些，我们是应该加以认识的。至于现在的中国，处在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铁蹄之下，已经陷入于动弹不得的窘境。中国整个的国家，因输入超过输出，现金源源外溢的结果，一天穷于一天。不但国内的新式的机械工业在现状下毫无发展的可能，就是‘以农立国’的我国所素来自夸的那种农业也急剧地正在崩